

## 青未了

## 人文 齐鲁



▲1993年5月3日于九江“蔡公时烈士纪念碑前,左三为蔡今明,右一为蔡今任

## 蔡公时烈士的女儿蔡今明谈往事： 65岁方知 自己是蔡公时之女

蔡今明口述 王丙记录整理

1928年5月3日,日本侵略者在济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“五三”惨案。日寇以残忍手段,杀害了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山东特派员、我的父亲蔡公时。因我自小被父亲好友收养,直到1992年65岁时才明白自己是蔡公时的女儿。

### 幼时被抱养

#### 遭养母虐待仍为其送终

我生于1927年,出生后患脾疾,肚子肿胀很大。母亲抱着我从南京来济南悼念父亲,顺便让父亲好友查尔炽给我看病。

查尔炽曾任山东栖霞县长,卸任后闲居济南。查与第一夫人费氏,生有儿子叫查禄昌。查尔炽在天津的兄长无子,按当时风俗,他只得把儿子过继给兄长。查在济南娶第二夫人李氏,未曾生育。查尔炽精通中医学,尤其擅长治疗儿科疾病。查尔炽见我病情严重需要长期诊治,就提出收养我。母亲考虑再三,即狠心托查尔炽抚养。他后来给我起名查学敏。我在养父的精心调治下,病情逐渐好转。

我4岁左右时,养父的兄长病故,他需要搬到天津管家。他到天津后,对堂侄查禄昌详述了抱养我的事情,并嘱咐他严守秘密,对人只说我是李氏所生。

查家祖辈在天津是有名的官商富户,养父来天津后不久就病故了。他儿子查禄昌不会持家理财,家业很快败落。后来全家迁往北平就是现在北京,最后定居朝阳门里东湖水井胡同。养母李氏把我当成她买来的丫头女仆,一不顺她的心就打骂我,使我饱受了苦难和折磨。养母也不让我上学,我除上过一年小学外,基本靠我刻苦自学,到我十六七岁时,已有了基础文化知识。

1945年8月,日本投降,我舅家表姐叫陈连堂介绍我到东北锦州进了战地医院进修班,学习一年后我在国民党战地医院当了准尉护士。

我早就意识到李氏不是我的亲妈,但想到是她和查家把自己养大成人,应该知道感恩。我把每月津贴,都给北平养母寄去。养母于1951年12月病故,是我为她养老送终。

1948年,哥哥查禄昌托本家叔叔把我调回北平,进了市

卫生局中南海卫生所。后来又调到224临时战地医院。

### 获得新生

#### 定居济南

1949年1月,北平和平解放。1949年夏,华北联合大学进驻北平,224医院经整顿,调入华大成为它的附属医院。1950



蔡公时戎装照,李烈钧称之为“外交史上第一人”。



2001年10月于台湾嘉义市蔡今任家中,蔡今明送给哥哥80寿诞礼物百寿图。

年我入团不久,医院领导让我到华大吴玉璋校长身边当了专职保健员。吴校长平易近人,和蔼可亲的形象,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。

我于1950年9月30日与刘永昌结婚。1970年随刘永昌调至位于东营的华东石油学院。后又随之调往济南,于1987年离休。

### 堂哥解密

#### 65岁方知自己真实身份

1992年4月,我接到北京亲戚电话,让我到堂哥查禄百家去一趟,说有事情相告。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北京。由在京工作的儿子陪同到堂哥家。堂哥查禄百已80有余,满脸沧桑,他详述了堂叔查尔炽抱养我的事情。他说,这是几十年来压在自己心中的重石,过去都没有条件说这事,说了怕对你不利。现在是天高地利人和,再不说,我这把年纪,有个三长两短,怕对不住蔡公时烈士,也是对你的不公。我早就知道自己是被抱养的,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然是蔡公时的女儿,不敢相信这是真的,心中五味杂陈,脑子一片空白……我告别堂哥后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。我想,从南京到济南、天津、北平、锦州、北京、东营;每个地方都有条件和可能落户扎根,是父亲灵魂紧紧牵着自己,使他的女儿最终又回到济南扎根落户,永远陪伴着父亲。我一生不信鬼神。但我相信,父亲的英灵在冥冥中一直和我在一起。

我由京回济后,马上向山东党委书记徐广胜汇报。山大向省政协通报并让他们帮助落实这个事。省政协委托蔡公时家乡江西省九江市政协帮助办理。九江市政协召集蔡家遗属多次座谈、回忆、“内查外调”,最后确认,查学敏确是蔡公时的女儿。

1993年3月初,我收到九江信函。是蔡公时侄孙蔡报海所写。信中谈,查学敏就是蔡公时的亲女儿,在台湾还有位同父异母哥哥叫蔡今任,并写明具体地址,让我与他联系。我并未主动与台湾蔡今任联系。不久却收到台湾蔡今任来信。他信中谈到家乡去信情况,表达了有生之年找到妹妹的喜悦。请求妹妹到九江认祖归宗。到时他会从台湾回到家乡,5月3日共同到父亲纪念碑前告知一切,并一同祭奠家父。这时,我才意识到是更改姓名的时候了。我想,哥哥叫蔡今任,自己

就叫蔡今明吧!65岁,我才明白自己是蔡公时的亲女儿;才明白自己有了更大的责任。

1993年4月下旬,我由老伴刘永昌、儿子刘峰陪同赶到九江,受到家乡人民的热烈欢迎。在人群中,我不用介绍一眼就认出了哥哥,我俩紧紧握手,千言万语要倾诉,都化成不尽的热泪。5月3日,我与哥哥及其他亲属,在九江市甘棠公园“蔡公时烈士纪念碑”前进行了悼念活动。

1994年4月12日我收到哥哥从台湾寄来的赴台往返机票。我这次赴台在嘉义市哥哥家住了8天。我与哥哥是诉不尽的离情别意,谈不完的历经沧桑。我了解到哥哥在“五三惨案”发生时才6岁。后来进了遗族学校,学生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烈士子女。哥哥在这所学校完成小学、中学学业,后考入中央警官学校,毕业后进入警界服务。1948年到台湾嘉义市警界任职,至退休。

2001年10月,哥哥80大寿,他又给我寄来赴台往返机票。我再次乘机赴台,给哥哥祝寿。这次我在哥哥家住了两个月,走遍了台湾的大中城市,游览了台湾主要名胜古迹,深深感受到这里山明水秀,人杰地灵,处处展示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礼仪。我多么渴望两岸早日统一,共同携手建设美好、强大、统一的祖国。

### 与新加坡陈嘉庚后代接洽

#### 请回父亲铜像

2002年10月,中央电视台国际台驻山东记者站记者柴安东给我看了份材料,是2002年9月16日,新加坡某报载区如柏女士写的报道《埋在地下的烈士铜像》,报道了铜像历史由来:1928年济南“五三”惨案消息传到南洋各地后,爱国华侨首领陈嘉庚成立了“山东惨祸筹赈会”,除积极为受害者遗属筹募义款外,还向曾承铸中山陵孙中山铜像的德国厂家订购蔡公时铜像。铜像铸毕,原计划由新加坡转运济南。可铜像运抵新加坡后,抗日战争爆发,局势动荡,无法启运到济南,只好将铜像暂存陈嘉庚的一个树胶园内。后来这个树胶园由陈嘉庚侄儿陈共存接管。抗日战争中,日寇也侵占了新加坡,为使铜像免遭破坏,将铜像埋于地下,光复后,铜像才得以重见天日,后被安置在晚晴园(“孙中山南洋纪念馆”)。

我看完材料后,十分激动,几经周折拨通了新加坡陈共存的电话,表达了作为蔡公时的女儿,希望父亲铜像能够尽快回到祖国,回到父亲在济南的殉难地的愿望。我又给哥哥去电话,让他以兄妹名义给陈共存写信,表达将铜像请回济南的心愿。哥哥接电话后即刻写信签名盖章邮给了我。

2006年5月2日,蔡公时烈士铜像暨济南惨案纪念馆奠基仪式在趵突泉公园举行。我久久仰望着父亲那高大威武的形象,轻轻地呼喊着:“爸爸!爸爸!你在外漂泊78年,终于回到祖国,回到济南……”

我虽然已是85岁的老人了,但我要继续宣传父亲蔡公时烈士那高尚的精神和品格,力所能及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情,沿着父亲未竟之路,继续走下去,直至生命终结。

## “五三”惨案中

### 我父母的危难亲历

□董宝琳

1928年5月3日,爆发了震惊中外的“济南惨案”,也称“五三”惨案。惨案发生那年,我的父亲董在京是一位邮务员,母亲傅右西是家庭妇女,住在七大马路纬一路东安里。我们兄弟姐妹还没有出生。父亲供职的省邮政管理局——位于二大马路纬三路的德式洋楼建筑群被日军强占。日寇铁蹄下的济南,失去了往日的平静和安详,变成了一座可怖的人间地狱,鬼子兵在街上横冲直闯,砰砰砰地砸门,稍微开慢一点,他们进门就杀人,很多住户遭到灭门之灾!父亲便与同乡秘密商定回老家昌邑避难。下面记述的,是父母多次给我们讲述的逃离济南的危难经历——

当时中国军队(北伐军,济南人称“南军”)尚据城坚守,日军则拼命攻城,父母住的商埠已被日军占据。5月10日清晨,父亲扮作商人,母亲女扮男装,与三位同乡结伴,趁早晨日军哨卡松动,雇了5辆洋车,悄悄离开七大马路东安里的家,往小北门火车站进发。当行至至德街西首时,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,子弹横飞,吓得车夫扔下客人逃命去了。情急之下,父亲他们躲进一间临街小饭店,店主不知躲到哪儿去了。熬到中午,才又冒着稀疏的枪声继续往北行。逃了一段,一道高土岭横在面前——原来是铁路路基,当他们越过路基时,不禁都惊呆了——全副武装的日本兵

就卧在路基背后,原来这里是一个攻城阵地!眼前突然冒出几个青年,鬼子兵也摸不着头脑,或许把他们当成南军的便衣队了。后退来不及了,他们连人带包袱滚下路基,鬼使神差般把自己“送”进了“虎口”!

日本兵立刻包围上来,其中一人伸出胳膊夹住了母亲的脖子。母亲后来回忆说,怕也怕了,慌也慌了,反正是个死,豁上拼了!她一口就咬住了日本兵的手,父亲冲上去救她,这时,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:一发炮弹落地,就听“咣”的一声,巨大的气浪把人掀起来又扔到地上,烟雾和硫磺味呛得人几乎窒息,眼前什么也看不清了。还是父亲脑子快,趁机大喊一声:快跑!他拽起母亲就跑。父亲回忆说,当他拼命往北奔跑时,脑后不远处鬼子端着枪向他们射击,子弹贴着身子、头顶吱吱地飞过,包袱滚了,鞋子掉了,一阵猛跑狂奔,逃到小清河边上一个小村,听不见枪声了,人也瘫软在地上。

惊魂稍定,他们你看我我看看你,父亲的上衣袖子被打穿了两个窟窿,同乡董子良腿上被子弹擦破了一层皮。这时,许多村民围上来观看,打探消息,也有好心人端碗热水,或送点干粮给他们充饥。之后,父亲等5人来到小清河一个小码头,雇了一只小船,沿小清河往东走。行驶了一天一夜,到了寿光,又改旱路,辗转回到老家昌邑。奶奶见儿子儿媳平安到家,忙不迭地焚香祷告,乡亲们都来看望他们,因为听说济南已被炸成一片废墟……

“五三”惨案后的第二年,经过交涉,日本人撤离济南,父亲重回邮局上班,直到解放后1960年在山东省邮电管理局退休。母亲则做居委会工作,街坊邻居都称她为“热心的傅大娘”。如今,父亲母亲已经去世多年,但他们留下的这段逃难经历,成了我们全家永远抹不掉的惊心动魄的记忆。

